

已是9月中旬，大陸朋友在電郵、電話中說，尚未看到8月號刊物。本期有兩則讀者短文，都是回應本刊去年12月號的文章，可能都是因為這種滯後；好在這些重要話題沒有、也不會過時。而台灣學界朋友在9月初就看到新刊，並對封面和彩頁居然大都是日本漫畫，不免「更覺詭異」，這也未出編者所料。我們更期待讀者對本刊6月、8月一連兩期「反思改革二十年」的專題討論，發表評議短論。

——編者

堅守，抑或超越？

90年代末期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在旁觀者眼裏頗有點倉促收場、無疾而終的味道。但餘波未了。任劍濤的〈甚麼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共同底線？〉(2001年12月號)一文引起我的思考。

作者以關注公正問題抑或重視個人自由、偏愛羅爾斯抑或青睞哈耶克和諾齊克、對社會不公進行道德批判抑或訴諸憲政制度建設等為標準，來區分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不同旨趣，指出「當今中國只能對接古典自由主義，而難以對接新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在先，新自由主義居後，自由主義在西方的這種不可僭越成長過程證明，人權之不存，有限政府不得建立，談何社會公正？作者對底線的堅守是不難理解且值得讚許的。

但作者將批評的鋒芒直指新自由主義左右兼綜的理論風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格上，似乎尚可商榷。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完備性的自由主義言述」，企圖以畢其功於一役的方式解決自由、民主、公正、平等諸問題，有建構自由主義烏托邦之嫌。在中國語境下這樣的提醒是十分必要的，但若以此來反駁新自由主義卻失諸簡單。

在西方歷史上，古典自由主義是針對現實問題的解決方案，所以並非一種完備的理論體系。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是與自由主義理論追求完備性的內在衝動密不可分的。而在當代中國，低調理論不敷應付嚴重問題，高調理論又不利於底線的守持，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這種處境無疑是尷尬的。這也許不能歸咎於理論本身，而是現代化的「後發劣勢」所致。這種劣勢不僅體現在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層面，而且也體現在西方現代理論的移植層面。

基於同樣的理由，無論作者怎樣將新自由主義者偏離底線、追求超越的原因歸結於良心壓力與鄉愿意識，還是新自由主義的完備性帶來的理論魅力，都有將新自由主義者幼稚化之虞。新自由主義者的「社會公正」心結，更可能來源於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複雜性的體認，而不是「為民請願」的良心

衝動。公正問題不僅是中國問題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關鍵的一部分。堅持公民自由在先，社會公正居後的「字典式排序」的一個強有力的理由，是這種安排避免了傳統政治權威中心以虛幻的平等許諾來扼殺個人自由。

倘若自由主義迴避關乎民生的社會公正問題，或提不出具體對策，就不僅會失去進入民間的話語權力，更會為政治權威操縱政策、製造公正假象留下足夠的空間。堅守底線、慎言超越是合理的，但在中國「後發劣勢」的背景下則必須做出理論鋪墊和制度調適。從這一角度來說，新自由主義者或有因「問題」而傷害「主義」之虞，而古典自由主義者則必須警惕因「主義」而遮蔽「問題」。

劉淳 香港

2002.7.23

對漫畫封面的一個回應

信箱裏橫躺着《二十一世紀》8月號的紙封，例行的公事也不管了，先讀為快才好。打開封套，躍入眼簾的封面刊頭字還是老樣子，搭配的彩圖卻不一樣了，一幅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畫的漫畫，有些吃驚。再看封底、彩頁，全是日本漫畫圖像，這下更覺詭異了。仔

細琢磨半天，才知道這是搭配吳偉明一文的匠心。又看見封二的文字說明，指漫畫是一個我們不能面對的視覺文化新世界。旨哉斯言。然而，稍稍覺得遺憾的是，和編者巧心相唱和的這篇文章略單薄了些。筆者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陌生人，不識之無，讀竟吳文，固然對他述說香江漫畫承受東瀛的影響，頗覺論證成功，卻還意猶未盡。蓋編者的問題意識濃重，確可挑起讀者的好奇心，惟則滿足這般好奇心的，居然只是也很「漫畫」的答案。

漫畫研究之所以可能，繫乎它在通俗文化裏佔有一席之地，關於它的「效果歷史意識」的思考與詮釋，正是方興未艾。所以，成功地論證香港和日本漫畫之間的生產「系譜學」，與我們對於揭開了「視覺文化新世界」的神秘面紗之後的期望，還是有段距離。

相形之下，台灣學界在這方面有所創獲。例如，2001年4月，台灣中國近代史學會，在理事長呂芳上教授的倡議下，舉辦了「漫畫中的歷史·歷史中的漫畫」研討會，針對「漫畫世界」的歷史圖像，進行了饒富意義的討論。好比說，在第二次中日戰爭的歷程裏，出入於虛構和現實之間，漫畫如何成為打鑄「國族想像」的一種工具？在二十一世紀之始，便在台灣引起熱烈爭議的漫畫《台灣論》（日本小林善紀原著）的思想背景，也成為解剖的對象。甚至於在歷史教學的過程裏，「歷史漫畫」是否可以成為一種「輔助教材」？漫畫在近代中國歷史舞台上的脈絡與軌迹，需要如是深入而多元的鏤刻；它在當代文化生活的意義，亦復如是。

在這個「機器再生產的時代」裏，大眾文化產品的生產者透過作品去尋找自己的觀眾（讀者），班雅明如是言之。透過大量複製，作為大眾文化產品的漫畫，它的「新世界」意義，其實可能和韋伯預言的文明囚籠的桎梏，更有異曲同工之妙。《二十一世紀》是中文世界裏積累這種可能性的動力泉源，它的編者投注的心血，就不該只是提供讀者視覺層次的驚艷而已。

潘光哲 台北
2002.9.5

重評孫文

近讀《二十一世紀》2001年12月號袁偉時先生〈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一文，感受頗深。作為一代豪傑，孫中山當然有許多值得我們研究和尊重的地方，這在過去學者汗牛充棟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揭示和體現。但也許囿於意識形態原因，為尊者諱、為長者諱，兩岸學者對孫中山思想中的專制腐朽的負面因素一直視而不見或不敢見、不願見，使我們恐怕還沒有超越章太炎和胡適之對孫的認識和批評。

袁偉時文章的「祛魅」工作使我們加深了對孫中山的了解和認識，這無疑是值得肯定的。李慎之先生也曾經說過：「孫中山也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熏陶培育出來的人，專制主義思想在他身上一樣根深柢固」，鑒於當時屢屢受挫的革命形勢，也影響孫中山的言行。如孫中山說要以黨治國，「是由本黨的主義治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本為吾之所倡始、所發明，其解釋須一

依我之解釋」，「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甚至說「中國人民直接並不受過很大的專制痛苦」，「中國人民自古以來都有很充分的自由」等等。梁啟超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說孫中山，「尤其是他的黨派見解，無論甚麼的好人，不入他的黨，多得挨臭罵，無論甚麼壞東西，只要一入他的黨，立刻變成了很好的好人。固然國民黨的發達，就是靠這樣投機者之投機，而將來致命傷也都盡在這般人之中。」後來，梁啟超這話真是不幸言中了。

當然，袁先生的工作也引起了某些「敏感者」的「狂批」，近讀台灣《傳記文學》胡志偉的〈文章無據偏多寫，語不驚人死不休〉一文（第八十卷第三期），當中大量運用充滿階級鬥爭和極左意識形態的語彙，文革式大批判腔調上綱上線地指責和攻擊袁偉時；胡先生從袁文中所看出的「微言大義」更是讓人觸目驚心，歎為觀止！因此，在看了胡文之後，筆者不能已於言，說了以上這些，就作一次「介入的旁觀者」吧。

張仲民 上海
2002.8.31

我們的錯誤和道歉……

2002年8月號「書介與短評」中，成慶評介之《張灝自選集》當非由許紀霖編輯，許先生乃該書策劃者。謹此更正並致歉。

編輯室
2002.9